

滿文檔案與新清史*

歐立德
哈佛大學
東亞語言與文明系

提 要

「新清史」一詞，乃是近幾年始出現的名稱，其反映晚近有關清代時期學術研究上的革新性趨勢。此名詞雖首見於美國，但在日本或其他地方較新的研究論著中已廣泛被採用。此一學術研究的主要特性，乃在於意圖洞察清朝統治的諸多要素，尤其是著重於儘管它是一個中國的王朝，但卻是由滿族所建立並領導的部分。

在這個逐漸形成的學術研究架構裡，史學家開始就中國歷史以及當代中國民族組成中滿族統治的意義上提出新議題。一般而言，新清史以挑戰漢族中心論述；經由新的範式探索過去（例如殖民主義）；並且由邊陲角度來審視歷史事件為其目標。簡言之，此一學術課題揭示非漢族的觀點，並把它整合於我們的歷史認知中。但是新清史並非僅僅是知識上的變化，它同時也呈現在語言上，在這方面最主要標誌在於研究方法上採用了漢語以外的其他語言記載之文獻。目前，滿語文獻是其中最重要的材料。在本論文中，我將扼要地簡述滿族檔案在新清史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展現且於未來仍將持續扮演的角色。

關鍵詞：清代歷史資料、滿文史料、清代史學史、清代檔案、清代歷史、滿族歷史

* 本文初稿為「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年11月3-5日）之主題演講。感謝李仁淵先生在中文譯稿上的協助。

自從清朝結束至今將近一百年間，清政府的文書檔案一直吸引著不同人們的關注，從書商、古物收藏家、博物館員、到社會評論者、政治人物與藝文界人士；甚至是造紙業者，對這些前清政府遺留下來的、浩如煙海的文件，也有他們自己感興趣的原因。當然讓造紙業者感興趣的原因，與我們齊聚在這場會議的原因全然不同。然而我不禁好奇，即使是我們這些歷史學者，可也是為了同樣的原因到這裡？或者這樣說，讓我們齊聚此地的是否就是相同的清代檔案？因為儘管我們一樣都對清朝有興趣，我們畢竟與這些檔案各自有各自的關連。我並不僅是說我們只看到與自己相關的檔案，而這些相關的部分彼此不同——雖然這也是事實。我想說的是：我們不僅是依循著各自特定的路徑走入世界各機構所收藏的清代文書檔案中，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又隨著各自特定的路徑走了回來。如果我們接受清朝檔案，一如各種其他的檔案一樣，不僅只是文書實體的總和（或者這些文書集體的存貯之處），而更是一個存在我們心中探詢過去的處所，是一個記憶形塑且被重新形塑的地方，那麼很明顯地，我們各自建構著自己獨一無二的檔案。這也意味著，沒有兩份檔案會是相同的。

這樣的說法聽來也許古怪，然而我認為，從我們每個人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在書寫歷史的這點來說，這個說法的真實性是可以確定的。從體認到歷史文書那種令人不安的、同時是窗又是幕的雙重性質當中，一種創造性的張力油然而起。那雜聲、那低吟、那張力本身方是最真實的檔案，而我們的歷史便是從這種張力當中誕生。如同大家耳熟能詳的，歷史文書本身是被動的，無法為自己發聲。

我之所以從這裡開始我的論點，是因為我認為建立起「清代檔案具有多樣性與生命力」的概念很重要。檔案並不是無生命的過往殘骸，可以輕易地任由我們切割、分類與揀選。檔案是活的，它與時而遷、沒有界線且變化多端。當我們閱覽本次會議的論文，或者俯瞰整個千變萬化又充滿衝突的史學論著時，上述這點表現的更為顯著。而這些著作全部，或者說很大一部分，都以清朝的檔案文書做為基礎。我之所以強調檔案的生命力與多樣性，這些我們投注其中、或者說我們本身即為其中一部份的特質，是因為這些特質便是新的歷史寫作不斷更生的背後因素。或者有人會進一步延伸此論點，認為每個新歷史的出現都需要新的檔案。在這篇論文中，我或許會反過來說，主張每個新檔案都需要一個新歷史。而在這篇文章中我所說的新檔案，即建立在清朝的滿文檔案之上。

在本文中，我將描繪這個新檔案的樣貌，或者是我所看到的樣貌，它的發展

過程，以及現在發展到什麼地步。我將為大家回顧從這些新檔案中醞生的新歷史，而在結論處，我打算簡短的討論此新歷史就我們理解清代史或一般而言的中國史來說，其所具有的重要意涵。

一、滿文檔案

在上千萬件十七到二十世紀清政府運作期間保存下來的檔案當中，約有兩百萬件，即約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全部或部分以滿文書寫。其中包含了各式各樣的史料，如奏摺、諭旨、紀錄、碑銘、史稿、人事記錄、帳目等等。幾乎每個清政府的主要部門都有滿文公文書；隨著不同部門、不同時期，有些部門的文書幾乎全部以滿文書寫。¹

這些史料的存在長久以來眾所皆知。清政府部分的官方事務是以滿文處理的這個事實當然不是什麼秘密。即使沒有人知道究竟確切的使用程度，而且很少人能讀懂，但是大家都知道滿文文書曾被使用。滿文是清朝兩種官方語言之一，特殊的滿文字母在當時的中國隨處可見，包括在銅錢這種最常使用的貨幣上，都鑲有滿文字母。至少在整個十八世紀，清廷以滿漢兩種語言頒佈主要政書，且公開地強調維持滿文能力的重要性。高級官員都被要求要學習滿文，且熟知清廷運作的人都知道，許多被政府單位聘用的人，他們的唯一工作，便是將不同官僚部門間往來的文書從滿文翻譯成漢文，或從漢文翻譯成滿文。爲了滿足這些人員的需求，北京出版商出版了可觀數量的辭典、手冊與文法書，讓任何人到琉璃廠都可閱覽選購。雖然十九世紀的中國文人認爲滿文的使用逐漸衰退，但此世紀下半葉來到中國的西方人，仍然覺得懂得滿文有助於與清朝官員間的交涉溝通。

於是當清朝統治結束之後，這些舊王朝的滿文文書開始在之前不曾出現過的地方出現時，沒有人會覺得奇怪。相反的，這些資料從1910年代開始公開流傳，且持續流傳到1920與30年代，都顯得如此理所當然。這是因爲，創造這些文書的政治秩序已不復存在，這些文書對國家乃至任何人已不再有用。特別是它們以難以辨識的異族文字寫成，而當這個異族政府的失政，是導致當下國勢陵夷的主因之時，還有誰會對這些文書有興趣？大家自然是想擺脫這些無用的前朝遺物。再

¹ 對這些資料更完整的回顧請參見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Language Archive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1-70.

者，由於民國時期強大的民族意識使得人們不再學滿文，於是這些被棄於街市的滿文資料有很大一部份最後都為外國人所買去。²除了少數例外，在這個時期只有一些日本與歐洲學者對收集與研究這些滿文書籍檔案有一些興趣。多虧他們，從在清廷的耶穌會教士開始的滿文研究傳統得以繼續。這些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的學者，儘管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的滿文造詣甚佳，但對於滿族入關之後的歷史並沒有很大的興趣。因而如同得了失憶症一般，對滿文曾在十七世紀中葉後仍持續使用的記憶可說都被抹去。

這樣的環境讓二十世紀初的清史學者對花費功夫學習滿文興趣缺缺。跟此時期大量編纂出版的清朝漢文文書檔案比起來，滿文資料可以說少到幾乎不存在。極少數可以取得的滿文資料，也通常是作為漢文檔案的副本出現，而這更導致了一種普遍的成見，即認為除了1644年之前的早期史料之外，所有的滿文資料都同時存在著相對應的漢文版本。而另一種普遍的成見更加強了「學習滿文沒有必要」的這種想法。即認為當滿洲入關之後，隨之與漢人同化，並且喪失了與漢人相分別的區隔意識。依據這個看法，既然滿洲人的思想與統治方式本質上都跟漢人一樣，那麼從這些滿文資料，便不可能找到史家在漢文資料中找不到的訊息與觀點，而既然漢文大家都懂得，且使用起來如此方便，那又何必花費心力去學習滿文？即使對懂得滿文的學者來說，這些想法也都被認為是無須證明的事實。因此，從任何一面來看，在這個時期，若開始想要瞭解清朝、或寫些有關清朝的事，閱讀滿文的能力都不被當作是必備的條件。³

然而從1970年代開始，這種態度慢慢開始轉變。有趣的是，這個轉變幾乎同時在臺灣、中國大陸與日本發生。在臺灣，陳捷先與莊吉發首先注意到滿文在研究滿清入關後之歷史的重要性。他們在發掘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清朝檔案並開始將之出版（通常與影本一起出版）的時候，發現並非所有滿文檔案都有漢文版本，而懂得滿文對史家來說並非全然無用。1977年故宮出版的《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第九輯，對改變這個看法有很大貢獻。雖然這批檔案不是第一批問世

2 對這個主題參考：Mark C. Elliott and James Bosson, "Highlights of the Manchu-Mongolian Collection," 80.

3 「即使是清朝初期，幾乎所有的滿文資料不是由漢文翻譯而來，便是已翻譯成漢文。對研究清朝中晚期的歷史學者來說，滿文史料或許有用，但非必要。」Joseph F. Fletcher, "Manchu Sources," 145.

的順治之後的滿文檔案（第一批出版的順治朝之後的滿文檔案是1971年兩百餘件的年羹堯滿文奏摺），⁴但不是年羹堯奏摺，也不是東洋文庫1972年出版的雍正鑲紅旗檔，⁵而是這一批檔案，第一次引起史學界廣泛的注意。不僅莊吉發以其中最有趣的一些檔案，轉抄翻譯為《清代準噶爾史料初編》，⁶而收錄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九輯中康熙征討噶爾丹時的滿文信件影本，也影響了日本史家岡田英弘，讓其在1979年出版經典著作《康熙皇帝的信札》。⁷從閱讀這些成果，以及從陳捷先的《滿文清實錄研究》、⁸《滿文清本紀研究》⁹中，學者們開始可以清楚的瞭解到，滿文材料對研究滿清入關之後的歷史也相當有用。

約在同時，在中國大陸的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也招募了一小群年輕、而經過特別訓練的專家學者，著手整理一史館的滿文收藏；這些收藏中，有些部分可說兩三百年來都沒有人接觸過。在1980年代早期，當第一歷史檔案館開始向學術界開放其部分館藏後，滿文檔案的重要性在中國也逐漸被體認。這很大部分要歸功於1981年創刊之新期刊《歷史檔案》上刊載的滿文史料翻譯，以及其他如開始於1978年的《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等特別的出版品。在整個八〇年代，無論在臺灣、中國大陸或日本，關於滿文作為清史研究之學術語言的重要性，開始有越來越多證明出現。

如上所述，臺灣與中國大陸學界逐漸體認到滿文材料重要性的共同因素，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回歸檔案」的趨勢，而這個趨勢很快地轉變了各地學者研究清史的方式。我也希望可以說，前述由此「回歸檔案」趨勢導引出來的、重新體認滿文重要性的新概念，造成的重大轉變，可讓許多這個領域的學生開始學習滿文，以期可以運用在他們的研究上。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除了在日本幾個重要學術中心的研究生要學習一年以上的滿文之外，無論在臺灣或中國大陸，都未曾根本地評估過將學習滿文納入博士班訓練一部份的必要性。儘管在兩地都有些具有冒險精神的人（包括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王鍾翰的一些學生）決定學習滿文，然而

4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三冊。

5 神田信夫等編，《鑲紅旗·雍正朝》。

6 莊吉發譯注，《清代準噶爾史料初編》。

7 岡田英弘，《康熙帝の手紙》。

8 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

9 陳捷先，《滿文清本紀研究》。

對滿文的態度大體上與之前相同：除非你計畫要研究十七世紀前半期左右的清史，你不用擔心滿文的問題；而儘管有與你主題相關的重要材料以滿文寫成，你也不用擔心，因為你用漢譯版本就可以了。翻譯在滿文檔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另一個課題，稍後我將再回頭討論。

在美國，如同在中國一樣，對滿文的態度也改變的很慢。在1970年代，普遍的看法仍是認為，除了研究相當早期的清史以外，沒有必要學習滿文。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期，關於滿文重要性的訊息開始為學界所知。以其研究軍機處的作品聞名的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是將此訊息傳達到美國學界的重要人物。在她大部分於故宮博物院進行的研究過程中，她發現了滿文檔案絕非僅是漢文檔案的副本，而這部分要歸功於她與莊吉發持續的交換意見。在1985年刊出的一篇文章當中，她直接陳述這個論點：

關於清朝滿文檔案廣為接受的認識是：以研究歷史課題來說，清史學者幾乎沒有必要去學習滿文、或者使用滿文史料。……然而與現今的看法相反……許多清朝中葉甚至晚期的滿文檔案，從未被翻譯成漢文。未來的清史學者應該會清楚地發現學習滿文相當值得。¹⁰

這個新訊息證實了Joseph Fletcher（與白彬菊保持聯繫）幾年前才說的：「從現在開始，一個清史學者如果要做第一流的檔案工作，必須要學習滿文，並且經常比較與其研究主題相關的滿漢史料。」¹¹

白彬菊的文章發表美中關係已正常化之際，這讓研究生接受檔案之「震撼教育」的這件事不僅只是可能，而更是必要且可行。資深學者甚至更有機會從這新開發的研究契機中獲益。因為即使已出版的滿文檔案相對來說數量甚微，這些檔案現在都可在臺灣、北京與瀋陽的幾個主要收藏處輕易覽閱。但是，如同在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情況一樣，在美國研究清史的學生並沒有掀起學習滿文的風潮，因此他們也無法利用收藏在這些地方的滿文檔案。似乎是大家都在觀望，想看看懂得滿文是否真得可以改變他們對清朝的觀點，讓他們的清史研究有所不同。

¹⁰ Beatrice S. Bartlett, "Books of Revel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Archival Record Books for Research on Ch'ing History," 33.

¹¹ Joseph F. Fletcher, "Review of Walter Simon and Howard G.H. Nelson, *Manchu Books in London: A Union Catalogue*," 653.

二、新清史的邏輯

從發現滿文檔案不僅只是漢文副本，而本身即構成了研究清史的獨立材料的這點，很多明顯而重要的問題引伸了出來：這些檔案說了什麼？更重要的是，它們說了什麼漢文檔案沒說的事？甚或，既然滿文是如此與漢文不同，即使在表面上相對應的文件中，它們要如何述說相同的事？有何隱微之異無法在漢文中發現？如果我們開始閱讀他們以自己的語言書寫的文件、從至今沈默無聲的滿洲那一面提問，我們對清朝的觀點會如何改變？這就如同我們忽然捕捉到來自過去的新頻率、發現過去的另一種聲音，而這個來自過去的新聲音可以直接對各種關於滿洲與清朝的新問題提出回應。這些問題，便是構成了現今所謂「新清史」的基礎。然而，這些新的問題是什麼？從何而來？而「新清史」的意義又在哪裡？

簡單的說，我認為新清史的主要特點是，大家都認真地重估大政統下的一些要素，而特別是著重這個政治秩序是與「清朝是一個中國的王朝，但同時亦是由滿洲人所建立、所統治」的事實相關連。新清史不贊成將清朝僅視為是又一個中國王朝，或者認為清朝與明朝相仿，僅是在表面上有一些改變。然而新清史的這種看法已挑戰了中國民族主義、以及帶有民族主義意味之歷史著作的一些基本準則，一些多數二十世紀現代中國史著作所遵循的準則。新清史於此提出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不僅討論了滿洲統治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同時也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相關。而其兩個主要問題是：第一，在人數如此稀少的情況下，滿洲人如何對如此複雜的政體維持這麼久的統治？第二，清朝為滿洲人而非漢人統治這點，對中國、中國人民以及中國歷史敘述來說有什麼差異之處？這些基本問題都不是新的，甚至可說對每個清史學家來說都已是經典問題，但對「滿洲人是誰」的重新體認，正顯示重新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刻已到來。這些正是引導出「新清史」的基本課題。

也許有些人會不同意上述對「新清史」性質的描述，而認為這樣的定義太過狹窄。確實，這個相對而言較新穎的詞彙仍保留某種程度的開放性（我似乎在五年前第一次使用這個詞彙，而兩三年前開始在正式出版品上看到它）。然而上面所說的是今日我想要討論的定義。

關於新清史的思想起源，我想指出兩個主要潮流，兩者都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其一來自許多年輕學者對改變研究中國之基本方法的渴切。在中國研究的領

域中，有些學者一方面覺得傳統漢學家太過沈溺在語言文字的無窮考據之中，但另一方面又對多半出於「區域研究」模式學者的「西方中心」偏見感到不滿。最有名的例子是柯保安（Paul Cohen）於1984年所提出的批評。他提倡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研究，以跳脫將中國的改變都視為是回應西方的觀點。¹² 第二股潮流是來自一群年輕學者，他們認為後現代主義對補正中國史這個在歷史研究中理論性相對而言較貧乏的領域很有用處。例如，即使像傅科這樣一個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中國仍只能是一個用來代表所有西方以外之古怪炫奇的符號，這有什麼的因素、有什麼樣的意義？¹³ 又如，我們如何來看待美國漢學建制中根深蒂固的「靜態文化主義的心態」（static culturalist mentality）？¹⁴ 另外一群學者也開始質疑，是否只有西方的中國史家將其文化偏見帶入研究當中，而一些深植於中國學界中的詮釋典範不需要被拿來重新檢驗？這個質疑在研究中國傳統社會邊緣群體——包括女性與非漢諸族——的學者們當中特別強烈。¹⁵ 對他們來說，「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已經不夠了。如同歐美學者欲建立一個跳脫東方主義的研究法，「新清史」的研究也尋求跳脫「大漢族中心主義」的侷限，發現非漢他者（non-Han other）的觀點，並將之整合進對整體國家與社會日益增加的瞭解當中。此研究同時也嘗試將滿族統治放入一個比較性的視界，將對大清帝國的研究與其他帝國的研究並置——不只是中國其他王朝，而更是世界其他地方——以建立一個比較史學的基礎，比較的帝國不僅包含亞洲的其他地區與近東，同時也包含歐洲。

這些思想潮流的衝擊讓新清史學者和其他一些學者一樣，都體會到一種迫切的需要，即需要將中國研究與對歷史的研究、以及對全體人類經驗的研究，無論在理論上與方法論上，都更有機地、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上個世代，這些潮流已對傳統上為中國史家、或一般而言的中國專家掌握的研究議題與方法，造成了很大的震動。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樂於見到這樣的變化，更別說不是所有人都跟

¹²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¹³ 如Haun Saussy的討論：Haun Saussy, *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146 ff.

¹⁴ Judith Farquhar and James Hevia, "Culture and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486-525.

¹⁵ 例如高彥頤（Dorothy Ko）在其書前言中批評婦女史中的五四敘述。見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以及米華健在其書前言中呼籲一個「以清朝為中心」的清史。James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隨著這個變化。儘管如此，我們這個領域已經在許多不同方面上都已轉變了。新的研究成果在不同主題紛紛出現：女性史；醫療、健康與身體；儀式與宗教；出版與書籍史；人口統計；經濟行為等。慢慢的，學術詞彙不斷變化、而學術討論更爲全面。如有一部分學者開始在世界史這個成長中的新領域裡，把中國晚期帝國史納入考量。世界史本身就是一個學術與政治趨向之下的產品，質疑偏向西方、認爲西方就代表世界文明史的知識體系。當全美的大學生其所修習的基礎歷史課程不是「西方文明史」而是「世界史」，而當全美都有教員要教授這個課程時，中國或一般所說的東亞史忽然變得重要起來，而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清朝是世界史與中國史的交會當中最明顯不過的地方之一，然而歸功於大量新穎的、具有批判性的學術研究，讓如何呈現清朝史成爲一份如此精彩有趣、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新清史可以是說這種震動之下的重要產物。如同前面所說的，其具有的獨特任務是挑戰大漢族中心主義的敘述、以其他的範式（如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去探索過去，以及從邊緣的觀點審視歷史發展。或許可以說新清史的哲學——如果有的話——多少如同蘇東坡的著名詩句〈題西林壁〉：「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作爲一個去中心的計畫，其已鼓動了更寬廣的學術討論，包括認同、民族主義、帝國等等，這些近年來我們共同所注意的題材。而如「想像的共同體」、「被發明的傳統」、「地緣實體」（geo-bodies）與國族目的論等，所有質疑民族國家之自然性質的概念，都與新清史的關懷相關。此外，新清史也接受「族群」（ethnicity）與「異己」（alterity）的新概念，將認同的「事實」部分問題化。這個理論傾向，讓新清史對中國這個「國家」而言，具有潛在的顛覆性，從中開啓了「什麼是『中國』？」、「成爲『中國人』是什麼意思？」等問題。但也就是藉著提出這些問題，新清史因而可以超越陳舊的漢化解釋，更深入滿洲統治中的重要問題。

然而，新清史並不僅是上述認識論的轉向，而同時也是一種語言學的轉向。換句話說，是上述的轉移學術趨向的兩股思想潮流，以及滿文作爲一種學術語言的重新發現，共同導引出新清史的研究。我想多數人都會同意，新清史研究在方法論上的主要特色是使用漢語之外的語言寫成的資料，不僅是包括滿語，也包含了蒙語、藏語、維吾爾語、韓語、日語、彝語，甚至是俄語、法語或英語。然而目前爲止滿文史料仍最爲重要，因此在這裡我的評論也只針對滿文部分。我所要

提出來的有兩個面向。其一是滿文檔案，一如多數的原始材料，會揭露經過出版過程的材料中所掩蓋的部分，即那些與國家立場對立、或者在國家體制之外的行動者的聲音，或者至少是與國家之間關係曖昧模糊的人的聲音。相較於已出版之官方資料偏向指向性（prescriptive），從國家事務的實際執行中產生的文書檔案則通常是描述性（descriptive）的。這並不意謂這文書檔案透明而沒有隱瞞，而至少是這些檔案透露更多官方敘述的表面之下較原始未修飾的材料，而因此可以讓我們提出更寬廣的問題。

另一個面向是，滿文檔案通常，雖然並非總是，啓示漢文材料中所隱藏的事情。讓我們回到滿文檔案最重要、也是最明顯的事實：它是以滿文寫成。這代表什麼含意呢？首先，這意味著檔案是由一種不同的字體寫成，是以滿文字母（或者音節，依不同觀點而定），而非以漢字為基礎。這種字體自然地讓清朝與千年來強大的亞洲內陸帝國譜系（包括蒙古與回紇）連結在一起。其次，其意味著這些檔案大部分以不同於中國的政治詞彙建立起來，其使用的詞彙或語句未必可在中文中找到確切的對應，而更不用說是英文了。換句話說，這是一種表現出自己獨特經驗與獨特感性的語言。這並不是說滿文比起漢文是更好的語言，或者說是更價值中立的語言。然而它就是一種不一樣的語言。如同我稍早提到的，在這不同之中有深遠的意義。如果可以與滿語調和，便如同我們之前所聽到的音樂一直是獨奏，而我們現在開始聽到第二個聲音，而從這二重唱中可以產生出新的和絃、不和諧音與切分音；這就等於是發現了一種新的音樂。然而無論是什麼原因，在這個面向中更深入的一點是，因為這些檔案是以滿文寫成的，如果要使用它，我們就得學習以滿文去讀它。

這最後一點，說來奇怪，或許是最難去接受的一點。為什麼呢？首先，這是要求人們去做一些事情，去學習他們所還未具備的技能。如同《莊子》中所說的「虛往實歸」，必須要將自己瓶子中的水倒一些出來，才可能裝新的進去。然而事情並非總是如此簡單。學習滿文不只是讀更多書、吸收更多理論或檢閱更多資料；而是習得新文法、發展新字彙，並且對一種新的文字培養出感覺來。學習滿文並不是特別困難，而不如說是要有時間。時間也是個因素，當我們體認到學習滿文代表我們有機會（或者說有義務——全看你怎麼看待它）去實際閱讀滿文資料，這也會花上時間。不只是我們閱讀滿文的速度比中文慢，我們將會發現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在句子間躑躅徘徊，重新思考已經知道的東西。即使只是將我們熟

悉的事物翻譯成另一種文字，當我們閱讀滿文的時候，這就如同我們第一次讀到這些東西，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它。我們的認知改變，且變得更為深入。這些當然是我們學習閱讀滿文的重點所在。

從新清史的角度來看，這也是為什麼只用滿文檔案的中文翻譯會不得要領。使用翻譯過的滿文檔案並不等於使用滿文檔案，除非這些翻譯出自你自己。這不只是因為翻譯可能出錯，更是因為沒有一種翻譯可以傳達自己親身閱讀檔案所得到的那種感覺。舉例而言，如果西方的中國史學家，只使用翻譯成西方語言的資料，而不直接閱讀中文史料，有誰會把他當一回事？也因為這樣，我們很難不對一直強調出版中文翻譯的滿文史料有種矛盾複雜的感覺。這種翻譯的趨勢反映了可理解的想走捷徑的期望，而同時也讓很多人可以取得這些檔案所包含的基本資訊。然而這些材料是翻譯過了的事實，已經讓他們失去了我們所認為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他們的特異感。然而就是這種存在於熟悉事物中的陌生唐突之感，方是新清史研究所要發掘與證明的。如果這些翻譯與滿文原件的影本或抄本一起出版，還比較可以接受，然而大家很少這樣做。有時候我會覺得，這些翻譯的最終目的是，讓所有該學滿文的人覺得學習滿文沒有必要。如果有人認為檔案不過是一些事實無生命的累積的話，那麼翻譯對他們而言沒什麼不對。然而以我自己來說，我忍不住會想像一種很諷刺的後果：滿文文書的翻譯，依他們翻譯成漢文的數量而定，一步步摧毀了滿文檔案的生命力。而這實在很可怕。

如果滿文檔案有未來的話，應該是新清史要為其擔保。同樣地，如果我們希望要創造一個完整的清史圖像的話，滿文檔案亦不可或缺。無論如何，應該進行的下一步當是，致力於提出新穎而重要的問題，引導出原創而吸引人的歷史，以此說服下一代的史家，新清史有其收穫，而閱讀滿文檔案更可得到其獨特的收穫。

三、清史研究的新視野

對我們瞭解清朝來說，之前我提到有兩個基本的核心問題：第一，滿洲人如何以那麼少的人口達到這樣的成就？第二，清朝異族統治的事實對現代中國有何影響？無論有沒有意識這樣做，新清史研究在這幾年來已經展現了一種新觀點，即將清朝從純粹為一個時代順序的時段名稱，轉變成一種描述性的詞彙，代表一

種特殊的政治風格、政治模式、政治統治。現在我要簡單地概述這個觀點，儘管它不是只有一種面貌，我試著歸納出大致的特點。此處我從我們對滿洲的新看法說起，這也是此新觀點開始的地方。

簡單的說，之前普遍的看法是，在滿洲人定居中國的這段漫長時間中，他們迅速而無保留地被佔人口多數的漢人所同化，直到與漢人之間不再有顯著的區隔。滿語使用的衰退、滿洲尚武精神的消失，以及許多旗人對漢人文化的熱衷，包括學術、禮儀與藝術等諸多方面，都被視為是滿洲人走向漢化的證據。當清朝結束之後，這同化的進程自然地形成「滿洲人已與其他所有的人緊密融合在一起」的結果，而印證了一句老話：中國總是可以吸納征服他的外來者。然而近來修正的看法現另一種圖像。雖然這看法也承認同化這個趨勢（我比較傾向使用「文化」[acculturation]一詞），新清史認為滿洲人從未失去他們在清代社會中是一個特殊群體的想法，而以漢人的角度來說，漢人也未曾認為滿洲人與他們自己完全相同。雖然學者們對於滿洲族群認同的性質、以及如何瞭解這種認同之時代變遷等意見未必全然相同，但大家的共識是，以某些方式，區分滿漢之間的界線在整個清朝甚至之後，始終都存在著。¹⁶ 滿漢分殊的看法在其他方面具有吸引力的理由是，它可以解釋何以反滿言論在十九與二十世紀都還能如此有力，並且也解釋了何以滿族至今仍被歸為少數民族。

這個對滿清入關後歷史的修正觀點挑戰了滿洲人之所以統治中國兩百六十七年，是因為他們根本上變成了中國人的說法。¹⁷ 跟這個論點不同，我主張滿洲人之所以可以成功主政，是因為他們沒有變成中國人。這是指，滿洲人正確的認識到，他們可以維持少數統治的原因，主要因為他們能夠一方面運用中國政治傳統，一方面又同時維持其獨特之認同。¹⁸ 總體而言，這樣的策略決定了他們身為統治者的種種舉措。如何達到這樣的平衡在此我們無法詳述（八旗制度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至少我們應該注意到滿洲人很仔細的閱讀自己的歷史，對其他異族王朝的歷史，如遼、金、元等等，也都知之甚詳。

16 主要可參考三本著作：Pamela Crossley（柯嬌燕），*Orphan Warriors and A Translucent Mirror*，及本文作者，*The Manchu Way*。

17 為此觀點辯護最力者見：Ping-ti Ho（何炳棣），“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123-55.

18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3.

這些對滿洲人的新看法，同樣也挑戰了關於辛亥革命與民國誕生的一些廣為接受的解釋。例如Edward Rhoads主張，雖然同樣參與新政的滿族政治人物與漢族政治人物部分利益重疊，但在政治算計上維持滿洲的利益仍是滿洲政治人物重要的考量。¹⁹ 然而，從重新探索滿文檔案得來的、對清朝國家與皇帝制度舉出的諸多重要問題，對清史或總體的中國史而言，或許意義更為重大。例如在整個清朝，除了要是統治者與官員之外，滿洲人同時也要是個「滿洲人」，由此我們便可預期滿洲統治對清朝的政治制度與政治運作，會有不見於明朝的獨特影響。這樣的角出自許多討論清朝中葉的作品，而「滿洲因素」在這些作品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顯著。²⁰ 再者，如果清朝皇帝有意識的採用之前征服王朝的統治模式的話，我們便應該可在清朝的皇權與帝國建構中找到這些起源的痕跡。從這個假設出發，新的研究便發現在清朝的皇權建構中，有不同於明朝的成分，其建構之皇權可說是引介自中國與亞洲內陸兩個不同政治秩序的混合體。此觀點對許多議題的研究甚有助益，例如清廷中顯著的藏傳佛教成分、清朝的多語現象、從非一般正式管道處理官方事務的偏好、對西北邊疆地區的重視與經營，以及其他各種議題。²¹

從這個方向看，新清史已經推動了許多有待探索的重要課題。如果我們往回看，整體性地研究與比較清朝與其他征服王朝（如遼、金、元），將會轉變我們對歐亞大陸東半部長久以來王朝統治模式的觀點。更進一步的說，新清史的觀點亦將改變我們對「中國」與「中國人」的基本概念，而影響我們對唐朝到清朝的歷史定位。我們也可想像得到，新的觀點也將觸動我們更進一步去探索農業文明與游牧民族間古老的互動關係，而引領到跨區域的比較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向前看，新清史也將與現代作連結。例如，新清史學者已經開始提出「清朝是

19 Edward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Pamela Crossley在其著作*A Translucent Mirror*的結論之處也探究了清朝滿族認同與民國政治意識型態之間的關連。

20 Beatrice S.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Philip Kuhn, *Soulstealers*; James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Pierre-Henri Durand, *Lettrés et pouvoirs*; Norman Kutcher,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nathan Spence, *Treason by the Book*.

21 請參見下述著作：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James A. Millward et al.,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Pamela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and “The Rulerships of China,” 1468-83.; Michael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Constructing Manchu Ethno-Dynastic Rule in China, 1751-1784.”

否是殖民帝國」的問題，²² 他們也將清朝對邊陲地區的政策與俄羅斯帝國、大英帝國、鄂圖曼帝國以及其他現代早期國家做比較，而提出我們是否可以稱清朝為「現代早期」(early modern)，如果可以的話，又是在怎樣的意義之下？²³ 清朝的世界觀為何？是否其認識世界的方式形成這個世界觀？我們是否可在地圖、在繪畫、在建築、在外交政策中看到其世界觀？²⁴ 在這之中有何意涵？這樣看待清朝的方式如何影響我們對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認識，尤其現代中國是從大清帝國中脫胎而出？從這樣的轉移過程中有怎樣的衝突與緊張關係？

也許新清史要提出來的最大問題是，我們可否不經質疑地直接將清朝等於中國？難道我們不該將其視為是一「滿洲」帝國，而中國僅是其中一部份？部分新清史的史家因此傾向在「清朝」與「中國」間劃下一條界線，避免稱呼清朝為「中國」，也不稱呼清朝皇帝為「中國」皇帝。

我在某種程度上贊同這樣的看法，因為我認為這樣的看法有助於讓我們更敏銳地注意到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更不用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了）是有不同政治目標的不同政治實體。即使在人口與地理上清朝與現代中國明顯重疊，兩者間也非密合無縫，而事實上有許多參差衝突之處。從1910、1920到1930年代如顧頡剛等知識分子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來，他們長期面對如何從大清帝國中創造一個新民族國家的難題。²⁵ 這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我們或許可說這個工作至今能未完成。因此，既然在很多方面清朝都比我們一般說的中國、或者比起宋朝或明朝時候的中國，包含的要多出許多，我們有理由在稱呼清朝「中國」之前先猶豫一下。雖然，我承認我同時也會擔心把這條「清朝」與「中國」之間的界線畫的太過明顯。畢竟我們稱法國為「法國」，無論它是個王國、帝國，或者是共和國，這種稱呼並不一定代表它們之間必然對稱相等。此外，滿洲人有時也稱呼自己的帝國為「中國」，即使是稱呼邊疆地帶。我在漢文與滿文檔案中都找到這樣的例

22 Nicola Di Cosmo, "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Inner Asia," 287-309.

23 參考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與他的其他文章。

24 James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Philippe Forê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Jonathan Hay,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 Lydia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also useful is the review essay by 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193-206.

25 王汎森的研究指出這一點。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子——這裡又再次證明滿文檔案的價值。

四、結 論

在做結論之前，我想先說明本文所提出的觀察並不包含世界其他地方的發展。例如在日本，便有一群成長中的學術群體與本文所提到的新清史有很類似的關注。²⁶ 他們的學術淵源與歐美學者大不相同，值得另文專論。提及這點的同时，我也要說這篇有其限度的文章並不是要主張滿文檔案是新清史研究的禁巒，也不是說唯有美國學者開始注意到他們的潛在價值。相反的，比起部分在1930年代就開始研討這個問題的日本清史學者，我們只能是後進之輩。在臺灣與中國，有小部分的學者持續的對此相關議題提出作品，²⁷ 只是對我來說我很難去評估這些地方年輕一輩學者對滿文檔案的看法有多強烈。只有在清代邊疆史這個領域可看出他們對滿文檔案的重視，其中有時可以看到較不受侷限的見解。²⁸

在美國或者也可說在歐洲，當代的學者重新評估了滿文史料在研究清史上的重要性。學者專家們過去一度曾經忽視這些材料，然而近來即使不是全部，也已經有相當多的學者體認到（或者正開始體認到），在重建清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種不同層面更完整的圖像中，滿文檔案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滿文檔案被重新定位的同時，在西方中國史家必定要遭遇的、研究中國之方法論與理論架構上，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而使得之前受壓抑的聲音、被隱藏的敘述，逐漸地浮出檯面。正是這兩股不同的潮流同時交會，引導出我們現在所說的新清史的興起。這其中並沒有什麼是空前的——如同所有的歷史學家都被灌輸這樣的概念：如果沒有不斷的修正，歷史就什麼都不是，而所有寫的好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對先前歷史的修正——我們必須等待，看看哪些從新清史所提出來的論點可以通過時間的考驗。對此，我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結局是，有一天我們這裡所說的新清史將會過時，而將會有新的新清史取而代之。

26 這群學者包括：岡田英弘、片岡一忠、中見立夫、石橋崇雄、楠木賢道、柳澤明、石濱裕美子、岡洋樹與杉山清彥。對近來此一趨勢的回顧見Kishimoto Mio岸本美緒，“The Ch'ing Dynasty and the East Asian World,” 87-109.

27 其中劉小萌、定宜莊、楊貞、杜家驥、賴惠敏等人的作品或許是最值得一提的。

28 值得一提的學者有馬大正、程崇德、華立。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三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莊吉發譯注，《清代準噶爾史料初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

二、近人論著

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臺北：大化書局，1978。

陳捷先，《滿文清本紀研究》，臺北：明文書局，1981。

岡田英弘，《康熙帝の手紙》，東京：中公新書，1979。

神田信夫等編，《鑲紅旗·雍正朝》，東京：東洋文庫，1972。

Bartlett, Beatrice S. "Books of Revel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Archival Record Books for Research on Ch'ing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6.2 (December 1985): 25-36.

———. *Monarchs and Minist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Berger, Patricia. *Empire of Emptines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Chang, Michael. "A Court on Horseback: Constructing Manchu Ethno-Dynastic Rule in China, 1751-178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1.

Cohen, Paul.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smo, Nicola Di. "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Inner 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2 (June 1998): 287-309.

Crossley, Pamela (柯嬌燕). *Orphan Warrio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A Translucent Mirror* and "The Rulerships of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5 (December 1992): 1468-83.

———. *A Translucent Mirr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Durand, Pierre-Henri. *Lettrés et pouvoirs*. Paris: EHESS, 1992.

Elliott, Mark C. and James Bosson. "Highlights of the Manchu-Mongolian Collection," in Patrick Hanan, ed., *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 Cambridg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2003, 79-122.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he Manchu-Language Archive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Late Imperial China* 22.1 (June 2001): 1-70.

- Farquhar, Judith and James Hevia. "Culture and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Positions* 1.2 (1993): 486-525.
- Fletcher, Joseph F. "Review of Walter Simon and Howard G.H. Nelson, *Manchu Books in London: A Union Catalogu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1.2 (December 1981): 653-663.
- Forêt, Philippe.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 Hay, Jonathan.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Hevia, James.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Ho, Ping-ti.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February 1998): 123-55.
- Hostetler, Laura.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Ko, Dorothy.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uhn, Philip. *Soulsteal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Kutcher, Norman.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Liu, Lydia. *The Clash of Empir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Millward, James A. et al.,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 *Beyond the Pa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Mio, Kishimoto (岸本美緒). "The Ch'ing Dynasty and the East Asian World," *Acta Asiatica* 88 (2005): 87-109.
- Perdue, Peter. *China Marches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olachek, James.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92.
- Rawski, Evelyn S.. *The Last Emper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Rhoads, Edward.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 Saussy, Haun. *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 Spence, Jonathan. *Treason by the Book*. New York: Viking, 2001.

- Spence, Joseph F. "Manchu Sources," in Donald Leslie et al., ed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 Canberra: ANU Press, 1973, 141-146.
- Waley-Cohen, Joanna.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Winter 2004): 193-206.
- Wang, Fansen (王汎森).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